

《脱卜赤颜》与元朝国史的编纂*

——兼论早期蒙古史多语种文献的关系

曹金成

内容摘要:《脱卜赤颜》是元朝以蒙古文撰修的国史。前人研究多将汉文史料中的“国史”视作《脱卜赤颜》，其实是混淆《脱卜赤颜》与元朝汉文纪传体本朝史所致。虽然《脱卜赤颜》与纪传体本朝史均以皇帝事迹为中心展开修撰，但二者更多地体现出并行纂修、独立撰就的生成特点，从而形成了元朝国史撰修中独具特色的蒙汉双轨修史制度。元朝还有一部蒙古文史书《金册》，虽与《脱卜赤颜》并非一书，但通过对二者关系的考索，可以管窥早期蒙古史多语种文献之间的传承谱系，尤其可以确证波斯文《史集》所参考的《金册》就是汉文《实录》的蒙古文译本。

关键词:《脱卜赤颜》 国史 《金册》 《史集》 《圣武亲征录》

《脱卜赤颜》(*Tobčiyan*)又作《脱必赤颜》《脱必禅》，是元朝以蒙古文撰修的国史。最早对《脱卜赤颜》进行专题研究的，是日本学者小林高四郎^①。后来，国内学者甄金在其基础上又作了进一步阐发^②；白·特木尔巴根亦发表过相关论文^③，但并未对甄金与小林氏的观点予以关照与对话；还有学者转而重点考察《脱卜赤颜》的纂修者、内容及相关的保管制度^④。

*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东平土人与元初政治研究”(25CLJJ11)阶段性成果。

①[日]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の研究》，日本學術振興會，1954年，第72—83页。

②甄金：《蒙古秘史学概论》，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48—161页。

③白·特木尔巴根：《蒙古族古代文学文献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18—225页。

④朱翠翠：《蒙元朝的必阁赤与脱卜赤颜》，《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第42—54页。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关于元代《脱卜赤颜》的基本史料均为小林高四郎所揭出,但研究者对这些史料的甄别与辨析仍留下诸多可商之处。本文即在重新检讨基本史料的基础上,充分回应前人诸说,对《脱卜赤颜》的性质与内容,以及《脱卜赤颜》与纪传体国史、《金册》(Altan Debter)等史籍的关系,进行全新研究。

一、《脱卜赤颜》的性质与内容再探

《脱卜赤颜》即蒙元汗廷用蒙古文编修的国史,这一点已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但这种认识主要是概而言之,故关于《脱卜赤颜》的性质与内容仍有必要作一番深入探析。

《元史·文宗纪四》在至顺二年(1331)四月戊辰提到:

奎章阁以纂修《经世大典》,请从翰林国史院取《脱卜赤颜》一书以纪太祖以来事迹,诏以命翰林学士承旨押不花、塔失海牙。押不花言:“《脱卜赤颜》事关秘禁,非可令外人传写,臣等不敢奉诏。”从之。^①

此事在同书《虞集传》中亦有记载:

帝以尝命修辽、金、宋三史,未见成绩,《大典》令阁学士专率其属为之。既而以累朝故事有未备者,请以翰林国史院修祖宗实录时百司所具事迹参订。翰林院臣言于帝曰:“实录,法不得传于外,则事迹亦不当示人。”又请以国书《脱卜赤颜》增修太祖以来事迹,承旨塔失海牙曰:“《脱卜赤颜》非可令外人传者。”遂皆已。^②

以往学者大多根据上述史料指出,《脱卜赤颜》由翰林国史院掌管^③。然其中所涉“翰林国史院”,实际上指的应是“蒙古翰林院”^④。蒙古翰林院系至元十二年(1275)三月从翰林国史院分出,“专掌蒙古文字”^⑤,自然

①宋濂:《元史》卷三五,中华书局,1976年,第784页。

②宋濂:《元史》卷一八一,第4179页。

③白·特木尔巴根:《〈蒙古秘史〉文献版本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6—37页。白·特木尔巴根:《蒙古族古代文学文献研究》,第220页。朱翠翠:《蒙元朝的必阁赤与脱卜赤颜》,《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2辑,第54页。

④屈文军:《元代翰林机构的成立——兼论元初中枢体制的变迁》,《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1期,第115页脚注③。

⑤宋濂:《元史》卷八《世祖纪五》,第165页。

也负责《脱卜赤颜》的编修。蒙古翰林院设有承旨、直学士、待制、修撰、应奉等官,延祐二年(1315)后定置承旨七员^①。文宗朝畏吾儿人阿邻帖木儿曾以翰林学士承旨修《脱卜赤颜》^②,其所任即为蒙古翰林院职官,故上引文中的押不花、塔失海牙二人也应是蒙古翰林院的翰林学士承旨。

上引文最值得注意的是,元朝史官将《脱卜赤颜》定性为“国书”,并指出所记为“事关秘禁”的“太祖以来事迹”。由此可知,自成吉思汗至文宗的蒙元诸帝事迹,皆载于《脱卜赤颜》。在这方面,最容易援引的证据就是今本《元朝秘史》(*Mongqol-un Tobčiyān*)所述太祖、太宗事迹。此外,世祖与文宗朝的《脱卜赤颜》亦见于文献记载,已为前贤所留意^③。以下仅就个别史料作进一步辨析与阐发。

1. 许有壬为马祖常所撰神道碑云:“时大奸当国,公首知其盗观国史,洎同列疏其十罪,仁宗震怒,罢之。”^④据《元史》本传,知“大奸”即仁宗朝宰相铁木迭儿,祖常时为监察御史,故有弹劾之权^⑤。关于铁木迭儿所“盗观”的“国史”,甄金“大胆推定,此即仁宗《脱卜赤颜》也”^⑥。然并无更多材料能够确证,故无法将其视作元代某一具体皇帝的《脱卜赤颜》。

2. 《元史·吕思诚传》云:“擢翰林国史院检阅官,俄升编修。文宗在奎章阁,有旨取国史阅之,左右舛匿以往,院长贰无敢言。思诚在末僚,独跪阁下争曰:‘国史记当代人君善恶,自古天子无观阅之者。’事遂寝。”^⑦

①宋濂:《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第2190—2191页。

②朱翠翠:《蒙元朝的必阁赤与脱卜赤颜》,《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2辑,第45—46页。

③[日]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の研究》,第75—76页。甄金:《蒙古秘史学概论》,第158—159页。白·特木尔巴根:《蒙古族古代文学文献研究》,第219、221页。

④许有壬:《敕赐故资德大夫御史中丞赠摠忠宣宪协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护军魏郡马文贞公神道碑铭并序》,傅瑛、雷近芳校点:《许有壬集》卷四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539页。

⑤宋濂:《元史》卷一四三,第3412页。

⑥甄金:《蒙古秘史学概论》,第159页。

⑦宋濂:《元史》卷一八五,第4248页。

前人皆将此“国史”等同于《脱卜赤颜》^①,实则不确。就内容而言,此“国史纪当代人君善恶”,与此前中国古代王朝“善恶必书”^②的国史几乎毫无二致。而据吕思诚本传,他作为汉人,所供职者为翰林国史院而非蒙古翰林院,故其所谏争者应非《脱卜赤颜》而是翰林国史院用汉文撰修的纪传体本朝国史。文宗是元朝诸帝中汉化程度最高者,读、写汉文毫无障碍^③,自然也有能力阅读翰林国史院以汉文所修国史。吕思诚很可能考虑到文宗汉化较深又对国史惩恶扬善的政治功用有充分认识,故以翰林编修的身份进行劝谏,从而收到意外的成效。

3.《元史·虞集传》云:“初,文宗在上都,将立其子阿剌忒纳答剌为皇太子,乃以妥欢帖穆尔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谓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驿召翰林学士承旨阿邻帖木儿、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书其事于《脱卜赤颜》,又召集使书诏,播告中外。”^④按,阿剌忒纳答剌于至顺元年(1330)十二月受封皇太子^⑤,故《脱卜赤颜》记妥欢帖穆尔非明宗之子应发生在此前后。但妥欢帖穆尔非明宗子的说法纯属编造,早已为周清澍所揭出^⑥,文宗大肆诬陷并将其载入《脱卜赤颜》来加强宣传,说明皇权合法性的书写与论证已成为《脱卜赤颜》编修的一大现实促因。

4.《元史·文宗纪五》至顺三年五月云:“撒迪请备录皇上登极以来固让大凡、往复奏答,其余训敕、辞命及燕铁木儿等宣力效忠之迹,命朵来续为《蒙古脱卜赤颜》一书,置之奎章阁,从之。”^⑦此朵来所“续”《蒙古脱卜赤颜》,殆就阿邻帖木儿与忽都鲁笃弥实所修而言。在此,所堪注意的

①[日]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の研究》,第79页。甄金:《蒙古秘史学概论》,第159页。白·特木尔巴根:《蒙古族古代文学文献研究》,第219页。

②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修订本)》卷七,中华书局,2021年,第452页。

③Herbert Franke, “Could the Mongol Emperors Read and Write Chinese?”, *Asia Major*, New Series 3, 1953, pp. 34-37.

④宋濂:《元史》卷一八一,第4180页。

⑤宋濂:《元史》卷三四《文宗纪三》,第770页。

⑥周清澍:《明成祖生母弘吉剌氏说所反映的天命观》,《周清澍文集》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16—418页。

⑦宋濂:《元史》卷三六,第803页。

是《脱卜赤颜》的内容。邵远平曾认为《脱卜赤颜》即“今之起居注”^①,此说后为魏源所沿袭^②,但受到小林高四郎的质疑,并以元代起居注所录为“臣下奏闻事目”予以驳斥^③。不过,若考虑到元代起居注的萌芽可能就是大蒙古国时期君主的言行记录^④,那么《脱卜赤颜》倒与其有诸多仿佛之处。成吉思汗召见长春真人丘处机时,二者的谈话被“左右纪以回纥字”^⑤,也就是用畏吾体蒙古文记录下来。据拉施特记载,按照当时的草原习俗,蒙古大汗的言辞都会被专职侍从记录下来^⑥。类似的言辞在罗桑丹津的《蒙古黄金史》(*Altan Tobči*)中有集中记载^⑦,虽然无法达到每日必书,但显然也是《脱卜赤颜》的部分内容。当然,这类言辞的书面化,只能是在1204年成吉思汗灭乃蛮俘获其掌印官塔塔统阿并命其“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后才得以实施^⑧。关于此前成吉思汗的祖先世系及其创业史,根据追忆的细密或疏缺而形成的文字记载也或详或略,根本无法做到逐年叙述,更谈不上逐日记载,由此与其他相关言辞、事迹一起所生成的历史文本只能被视作“简史”“纲要之史”或“史纲”,而这正是“脱卜赤颜”的本义^⑨,所谓《脱卜赤颜》得名的缘由或可作如是观。

除了大汗的言行,文廷式还推测蒙古“律令”可能也是《脱卜赤颜》的

①邵远平:《续弘简录元史类编》卷九《文宗皇帝》,《续修四库全书》第313册影印清继善堂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31页。

②魏源:《元史新编》卷十三《文宗纪》,《魏源全集》第8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322页。

③[日]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の研究》,第80—81页。

④张帆:《元代实录材料的来源》,《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第68页。

⑤李志常著,尚衍斌、黄太勇校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卷下,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04页。

⑥[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86页。

⑦罗桑丹津著,色道尔吉译:《蒙古黄金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0—221页。

⑧陈得芝:《元代多元文化社会的言语文字二题》,《蒙元史与中华多元文化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83页。

⑨Kowalewski, *Dictionnaire mongol-russe-français*, Tome Troisième, Kasan: Imprimerie de L'université, 1849, p. 1822. 姚从吾:《漫谈〈元朝秘史〉》,《姚从吾先生全集(五)》,正中书局,1981年,第206页。

一部分^①。近来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成吉思汗家族的世系、蒙古传统与帝训、功臣事迹是《脱卜赤颜》内容的三大方面^②。白·特木尔巴根还注意到,元代藏文史书《红史》也节录了《脱卜赤颜》中的成吉思汗家族世系^③。笔者曾探讨过明初藏文史书《雅隆尊者教法史》所抄《脱卜赤颜》中的成吉思汗家族世系,并将其与《红史》所记进行对勘与研究,可证《脱卜赤颜》开篇应为蒙古起源以及成吉思汗祖先世系与事迹,后逐渐下延至成吉思汗及其直接继承者,正与今本《元朝秘史》相合^④。至于《脱卜赤颜》中的功臣事迹,除了上引《元史》所提燕铁木儿外,还可举出一例。许有壬为参与成吉思汗班朱尼盟誓的功勋重臣克烈人镇海所撰神道碑载:“《国史》曰脱必赤颜,至秘也,非有功不纪,公名在焉。”^⑤但《脱卜赤颜》对功臣这种具名的记载,应无法与传统汉文国史纂修中的功臣列传等而视之,应该只是在《脱卜赤颜》所述蒙元诸帝的编年史中被顺带提及罢了。

综上,《脱卜赤颜》几乎在蒙元时期历朝皆有撰修,蒙古翰林院将成吉思汗祖先及其本人和继承者的言行置于编年的时间脉络,既撰写本朝新史,又修订前朝旧事,同时亦穿插着草原习俗、功臣勋绩等内容,从而形成了元代用畏吾体蒙古文所书写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官方历史文献——国史。狭义而言,《脱卜赤颜》即具体某一皇帝的史书,如文宗朝《脱卜赤颜》;或某一具体时段的王朝史,如今本《元朝秘史》所录成吉思汗与窝阔台汗时期的历史。广义而言,可以“国史”概称《脱卜赤颜》,指的是以蒙古皇帝为主线的大元王朝的历史,甚至直到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后,这种以大汗为中心所编写的《脱卜赤颜》在草原汗廷仍未断绝^⑥,故不难想

①文廷式:《纯常子枝语》卷三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165册影印民国三十二年刻本,第462页。

②朱翠翠:《蒙元朝的必阁赤与脱卜赤颜》,《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2辑,第47—52页。

③白·特木尔巴根:《蒙古族古代文学文献研究》,第222—223页。

④曹金成:《〈雅隆尊者教法史〉蒙元史事考辨》,《史林》2020年第1期,第44—47页。

⑤许有壬:《元故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铭》,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8册,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83页。

⑥清代蒙古族史家罗桑丹津《蒙古黄金史》即将《脱卜赤颜》续编至林丹汗(罗桑丹津著,色道尔吉译:《蒙古黄金史》,第335—347页)。

见其在元朝官方史书编撰中的独特地位。那么,又该如何看待《脱卜赤颜》与元朝翰林国史院以汉文编修的国史之间的关系呢?以下即试作考察。

二、元朝蒙汉双轨的修史制度——《脱卜赤颜》与纪传体国史

上节的论述中,已辨析了《吕思诚传》所言元文宗所阅“国史”并非《脱卜赤颜》。实际上,前人将其断定为《脱卜赤颜》,主要还是对元朝翰林国史院所修国史缺乏足够重视。本节即重点探讨元朝国史的纂修,并将其与《脱卜赤颜》进行比较研究,进而揭示元代独具特色的蒙汉双轨修史制度^①。

元朝的国史由翰林国史院纂修,主要包括历朝实录与后妃功臣列传^②。后妃功臣传大约撰修于成宗时期,后单独成书,“具有成编”^③。其中收录了哪些功臣,虽可顾名思义略加揣测,但国史今已不存,故实难具知。据萧启庆研究,元朝后妃功臣列传在纂修时,主要以苏天爵《国朝名臣事略》为蓝本,在内容上“因袭者多,出入甚少”^④。由此可见其功臣名录主要涵盖了蒙元王朝开国的文臣武将、灭宋元勋、大儒巨子等四十七人^⑤,都是元朝前期的名臣。此后王祚在苏书基础上撰成《国朝名臣列

①按,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王朝以本族文字和汉文双轨并行的修史实践,最早出现在辽代,主要体现为“契丹文字与汉字双轨并行、彼此独立运转的史官制度”(苗润博:《〈辽史〉探源》,中华书局,2020年,第12—13页)。前人虽曾提及元代的蒙汉双轨修史,但将具体撰修过程判断为《太祖实录》首先系汉文撰就,后来又被翻译成蒙古文,进而为波斯文《史集》所参考(详参张晓慧:《元代的蒙汉双轨修史:〈太祖实录〉小字注解探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170—175页)。

②张帆:《元代翰林国史院与汉族儒士》,《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5期,第76页。

③时培磊:《元代实录纂修问题考辨》,《文献》2010年第3期,第118—120页。

④萧启庆:《苏天爵和他的〈元朝名臣事略〉》,《元代史新探》,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第331页。虞集《讲毕奏特加藁城董氏封赠表》云:“故中书左丞文炳,受知世祖,亲从伯颜,身兼省院之官,提军讨灭宋国,事载国史,昭如日星。”(王颉点校:《虞集全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87页)而董文炳恰被苏天爵列入“国朝名臣”,可为萧先生此说补充一证。

⑤韩儒林:《影印元刊本〈国朝名臣事略〉序》,《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1页。

传》，虽已佚失，但其文集收有为许衡、郭守敬所撰《拟元列传二首》，以及为金履祥、许谦所撰《拟元儒林传二首》，于此不难管窥《国朝名臣列传》的传主及其身份^①。

此外，勾稽元代文献，还能更清晰地获取收入功臣列传的其他数人，列表 1 如下：

表 1 元朝国史所录功臣统计表

序号	人物	族属	记载
1	庄武公	蒙古	庄武公，国之名族，其功业在国史，刻碑墓道。 ^②
2	别的因	乃蛮	答禄将军世为乃蛮部主，归国朝，拜随、颍万户，平金有功。事载国史。其出守信阳，射虎之事尤伟。 ^③
3	月忽难	汪古	月忽难历事太宗、宪宗、世祖三朝，终于礼部尚书，有传在国史。 ^④
4	马祖常	汪古	公之家世勋阀，具国史及墓碑。 ^⑤
5	余阙	唐兀	公唐兀氏，讳余阙，字廷心，元统癸酉甲科进士。其历官次第言行政治，具见国史。 ^⑥
6	高睿（高智耀次子）	唐兀	次睿，自符宝郎官至御史中丞……溢贞简。行事爵里，则有国史、家传在。 ^⑦
7	李恒	唐兀	公之世爵行业，有国史之传。 ^⑧
8	马清献公	色目	惟清献之历官行事，著在国史。 ^⑨

①陈高华：《〈元史〉纂修考》，《陈高华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 年，第 475 页。

②虞集：《贞节夫人怯列牟氏传》，王颀点校：《虞集全集》，第 851 页。

③迺贤：《答禄将军射虎行》，叶爱欣校注：《迺贤集校注》，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07 页。

④黄潛：《马氏世谱》，王颀点校：《黄潛集》第 3 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年，第 727—728 页。

⑤王守诚：《石田先生文集序》，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 39 册，第 396 页。

⑥戴良：《余幽公手帖后题》，李军、施贤明校点：《戴良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年，第 248 页。

⑦虞集：《重建高文忠公祠记》，王颀点校：《虞集全集》，第 663 页。

⑧柳贯：《李武愍公新庙碑铭并序》，魏崇武、钟彦飞点校：《柳贯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 年，第 238—239 页。

⑨虞集：《马清献公墓亭记》，王颀点校：《虞集全集》，第 667 页。

续表

序号	人物	族属	记载
9	铁柯	迦叶弥儿	公之行事,国史载之矣。 ^①
10	史坝家族	汉人	公先世皆大臣,事在国史。 ^②
11	宋褰	汉人	公讳褰,字显夫,历官行事,当勒之墓碑,书之国史,此不著。 ^③
12	张养浩	汉人	公讳养浩,字希孟;“云庄”,其自号也。行业履历,家乘、国史有载,兹不容赘。 ^④ 公之文章传海内,德业具国史,斯不待赞而彰也。 ^⑤

值得注意的是,表1所列元朝国史所收录的人物,既有蒙古人,亦有色目人与汉人,除了第一位“庄武公”与第八位“马清献公”外,其他在《元史》均有传^⑥。此外,蒲道源《送洋州达鲁花赤序并诗》云:“今洋侯也速达儿者,果能以事亲恭顺。父丧居庐,负土成冢。孝感致异,监司连帅上其事,大臣以名闻。天子嗟异,诏国史特书旌表,起白衣授五品职而劝奖之。”^⑦李存《复通宗师吴闲闲》云:“他日修本朝国史,方外之传,丘、马已后,便及开府大宗师。”^⑧说明元朝国史还包括孝友传,以及与方外有关的释老传。进而可推,儒学、忠义、列女等传亦是国史编撰的部分内容,而这类列传亦见于今本《元史》,由此不难看出元朝国史在体例上对明修《元史》的

①吴澄:《题秦国忠穆公行状墓铭神道碑后》,方旭东、光洁点校:《吴澄集》第3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244页。

②虞集:《江西省左丞史公神道碑》,王颀点校:《虞集全集》,第1103页。

③危素:《燕石集后序》,钱伯城等主编:《全明文》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358页。

④李术鲁翀:《张文忠公归田类稿序》,李鸣、马振奎校点:《张养浩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第1页。

⑤苏天爵著,陈高华、孟繁清点校:《滋溪文稿》卷三《七聘堂记》,中华书局,1997年,第32页。

⑥别的因传,在《元史》卷一二一;月忽难传,在卷一三四(作月合乃);马祖常、余阙传,均在卷一四三;高睿、铁柯传,均在卷一二五(作铁哥);李恒传,在卷一二九;史坝家族,在卷一四七、一五五;宋褰传,在卷一八二;张养浩传,在卷一七五。

⑦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21册,第201页。

⑧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33册,第266页。

直接影响。

以上不耐其烦地论述,旨在说明元代文献语境中的国史在大多数情况下指的还是用汉文撰修的纪传体本朝史,这与《脱卜赤颜》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一方面,《脱卜赤颜》中虽有功臣事迹,但只是夹附于皇帝纪事中捎带叙述,与国史中独立成篇的功臣传迥然有别。明乎此,再来审视元代文献的相关记载,自会别有一番认识。吴澄为西域人玉元鼎所撰字说,提到其祖先玉速阿剌随成吉思汗征伐,因参与班朱尼盟誓,共饮黑河之水,故“为勋旧世臣,家名载国史”^①。黄潛为蒙古逊都台人脱帖穆耳所撰墓志铭,也记载碑主高祖赤老温是成吉思汗的“开国元勋”“名在国史”^②。以往学者皆将这两处史料所涉“国史”等同于《脱卜赤颜》^③,然就表1来看,也不排除系用汉文所修纪传体本国史的可能^④。

另一方面,虽然《脱卜赤颜》与国史都以皇帝事迹为中心展开修撰,但二者更多地体现出并行纂修、独立撰就的生成特点。此处,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国史中的《太祖实录》。关于成吉思汗的《太祖实录》,最早编纂于中统三年(1262),所依据的基本史料是当时早已成书的《脱卜赤颜》^⑤。不过,《元史·太祖本纪》(史源为《太祖实录》)与今本《元朝秘史》纪事的个别差异,说明今本《元朝秘史》并非《太祖实录》所参考的那版《脱卜赤颜》。此外,笔者还注意到,《太祖实录》并非直接参考了《脱卜赤颜》的蒙古文文本,而很可能是通过某种中介语言转译后再用汉文直接记写的产物。最为明显的证据就是成吉思汗先祖纪事中所出现的“八里屯阿懒”(Baltun aral)与“押刺伊而”(Yalayir)二名,前者为地名,《元朝

①吴澄:《玉元鼎字说》,方旭东、光洁点校:《吴澄集》第1册,第195页。

②黄潛:《明威将军管军上千户所达鲁花赤逊都台公墓志铭》,王颀点校:《黄潛集》第3册,第847页。

③白·特木尔巴根:《蒙古族古代文学文献研究》,第220页。朱翠翠:《蒙元朝的必阁赤与脱卜赤颜》,《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32辑,第52页。

④关于吴澄所提“国史”,杨志玖曾慎重地指出:“现存能称为国史或与国史有关的资料,无非《圣武亲征录》、《元朝秘史》和根据元代历朝实录而修的《元史》,及西域史料的《史集》,而这些史书中都找不到玉速阿剌的名字,更无论其饮浑水事,不免令人遗憾。在找不到其他佐证以前,只好存疑了。”(杨志玖:《蒙古初期饮浑水功臣十九人考》,《陋室存稿》,中华书局,2015年,第346页)因此,在元朝修史的语境中,此国史更可能是今已佚失的元代以汉文所撰之国史。

⑤白·特木尔巴根:《〈蒙古秘史〉文献版本考》,第39页。

秘史》作“巴_勒淳阿_勒刺” (Baljun aral); 后者为部族名, 即《元朝秘史》中的“札刺亦儿” (Jalayir)^①。与《元朝秘史》中的蒙古文读法相对应, 八里屯阿懒(突厥语-tun 对应蒙古语-jun) 与押刺伊而(突厥语 Ya-对应蒙古语 Ja-) 记写的是其突厥语读音。所以, 至少就成吉思汗先祖事迹而言, 《太祖实录》参考的《脱卜赤颜》经过了忽必烈汗廷操突厥语人员的转译^②, 而非直接从《脱卜赤颜》蒙古文本汉译而来。尤其是自忽必烈朝起用汉文直接纂修实录已成朝廷定制, 愈发与蒙古文《脱卜赤颜》的编撰分离平行、并驾齐驱^③, 从而形成了元朝国史撰修中独具特色的蒙汉双轨修史制度。

三、《脱卜赤颜》与《金册》

除了《脱卜赤颜》外, 元朝还有另一部蒙古文史书《金册》, 在辨析此二书关系的基础上, 可进一步重新审视早期蒙古史多语种文献之间的传承谱系。

由于《脱卜赤颜》深藏于汗廷, 《金册》也保存在大汗的金匱中, 所以有学者推测二者实为一书^④。但这种从规格与机密性出发得出的认识, 并没有多少说服力。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 翰林学士院的最高长官撒里蛮向皇帝进呈“金书《世祖实录节文》一册”^⑤, 即用金字所书《世祖实录》的畏

① 乌兰校勘:《元朝秘史(校勘本)》卷一、卷三, 中华书局, 2012年, 第8、99页。

② 蒙古汗廷中负责文书者主要为操突厥语的回鹘人, 详参 Igor De Rachewiltz, “Turks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Turco-Mongol Relations in the 13th and 14th Centuries,” in *China among Equals: 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 10th and 14th Centur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p. 282–285。本文此处的推论恰与此相符。

③ 元人杨维禎《白翎鹄辞二章》云:“按国史《脱必禅》曰:世皇畋于柳林, 闻妇哭甚哀。明日, 白翎鹄飞集斡朵上, 其声类哭妇。上感之, 因令侍臣制《白翎鹄辞》。鹄能制猛兽, 尤善禽鴛鵲者也。”(孙小力校笺:《杨维禎全集校笺》,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年, 第224页)《脱必禅》即《脱卜赤颜》。然此事不见于《世祖本纪》, 即可管窥世祖朝《脱卜赤颜》与《世祖实录》独立编修、互不干涉的生成路径。

④ [蒙]沙·比拉著, 陈弘法译:《蒙古史学史:十三世纪~十七世纪(修订译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年, 第93页。周良霄:《元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年, 第826页。

⑤ 宋濂:《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 第457页。

吾体蒙古文节译版,故名《金册》^①,与《脱卜赤颜》实非同一史书。

小林高四郎研究《金册》的专文,主要是为驳斥那珂通世所谓《金册》系修正版《元朝秘史》这一观点而作,最后顺带指出《金册》也非《实录》的节译,但并未给出直接证据^②。亦邻真也持类似看法。他发现《史集》所记蒙古高原地名 MWNCA,在读音上与《圣武亲征录》中的“莫那察”相同,而与《元朝秘史》中的 Mürüče 有别,从而推断拉施特所参考的《金册》中存在汉语词汇,由此认为《金册》应是《圣武亲征录》的蒙古文译本^③。此说见微知著,极具史学洞见。但细绎之下,仍有一些疑点有待进一步澄清。首先,亦邻真已注意到 MWNCA 在《史集》另一处写作 MWRYCAQ,这一写形更接近上述《元朝秘史》中的读音,而与《圣武亲征录》有异,又该如何解释?其次,《史集》所引《金册》对泰赤乌部起源的记载^④,则不见于《圣武亲征录》,显然与《金册》是《圣武亲征录》蒙译本的观点有悖。因此,当下很有必要对此说进行重新检讨。

最近张晓慧的研究已经意识到以上第一处疑点,并推测 MWRYCAQ 最后一个音节 CAQ 中尾辅音-q 的出现,很可能是用汉字“察”译写蒙古语音节 če 后又翻译回蒙古语的结果,并结合《史集》以汉语解释蒙古语札兀惕忽里之例,认为《史集》所利用的蒙古文史书很可能是以元代汉文实录为蓝本^⑤。其实,此前学者已表达过类似观点^⑥。需要指出的是,“察”

①余大钧:《记载元太祖事迹的蒙、汉、波斯文史料及其相互关系》,《北大史学》第1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49页。姚大力:《“成吉思汗”,还是“成吉思合罕”——兼论〈元朝秘史〉的成书年代问题》,《北方民族史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4—215页。

②[日]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の研究》,第84—100页。

③亦邻真:《莫那察山与〈金册〉》,《般若至宝:亦邻真教授学术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45—349页。

④[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294页;第1卷第2分册,第23页。

⑤张晓慧:《元代的蒙汉双轨修史:〈太祖实录〉小字注解探微》,《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第174页。

⑥刘迎胜即注意到《元朝秘史》所记成吉思汗先祖土敦篾年之妻那莫仑(Nomolun),被《圣武亲征录》《元史·太祖本纪》《史集》不约而同地误作“莫拿仑”,从而推测《史集》所据《金册》可能来自某种汉文史料(刘迎胜:《〈史集·部族志·札刺亦儿传〉研究》,《蒙古史研究》第4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页)。

字在元代并无尾辅音-q^①,不过张文所关注的拉施特以汉语词汇解释蒙古语这一书写特点,对笔者颇有启发。除了上述例证外,拉施特在提到王汗长子之名桑昆后,进一步补充:“意即汉语‘相公’。”^②不仅如此,成吉思汗的祖先察剌孩领忽被《史集》记作 Charaqa-līngqūm, līngqūm 即辽代部族官“令稳”(līngqum)的汉语发音^③,但在《元朝秘史》中则作 Čaraqai līngqu,缺失了词尾的-m 音^④,这就进一步证明《史集》所参考的蒙古文史料应是汉文《实录》的蒙译本。

至于《史集》所征引的基本蒙古文史料,最重要者当属《金册》。小林高四郎认为拉施特在编写《史集》时,并未将《金册》作为经常利用的史料,其中所引《金册》关于泰赤乌部起源的内容,很可能来自孛罗丞相的转述^⑤。此说不确。拉施特在编撰《史集》时,曾以第三人称的口吻明确交待其主要史料是伊利汗廷金库储藏的“零散[史籍]”^⑥。在《史集》的其他地方,他还提到自己所参考的用蒙古文记录的编年史,以零散篇章的形式保存在伊利汗的金库中,显即“零散[史籍]”,也就是《金册》^⑦。由此确证《金册》是《史集》编纂时所利用的一大基本史料,至此也可肯定:《史集》所参考的主要蒙古文史料就是《金册》,后者则为汉文《实录》的蒙古文译本。

循着亦邻真的研究路径,还可对《金册》所参考的《实录》作进一步研究。为便于分析,先将蒙古文、波斯文与汉文史料对莫那察的记写列表 2 如下:

①按,汉字“察”,元代八思巴字记其读音为 č'a,详参 W. South Coblin, *A Handbook of Phags-pa Chinese*,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p. 174。

②[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146页。

③陈得芝:《〈元史·太祖本纪〉(部分)订补》,《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2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页。

④亦邻真复原:《元朝秘史(畏吾体蒙古文)》,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9页。

⑤[日]小林高四郎:《元朝秘史の研究》,第90页。

⑥[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117—118页。

⑦[俄罗斯]巴托尔德著,张锡彤、张广达译:《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4页。

表2 蒙古文、波斯文、汉文史料所记“莫那察”一词

《元朝秘史》	《史集》(史源为《金册》)	《圣武亲征录》
Mürüče	MWNCA MWRYCAQ	莫那察(Monoca) 木奴叉(Munuca)

据表2可以清晰地看出:《史集》中的MWNCA即《圣武亲征录》中的莫那察/木奴叉,MWRYCAQ则对应了《元朝秘史》中的Mürüče。同一Mürüče在《史集》记写中所体现出的蒙汉文双重发音,透露出拉施特参考的《金册》所依据的《实录》,应是介于蒙古文《元朝秘史》与汉文《圣武亲征录》之间的过渡文本。

以上主要是从文本生成的角度,来论证《金册》与《脱卜赤颜》并非一书。就内容来看,二者也存在显著差异。拉施特在记载蒙古先祖的起源时曾说,蒙古人起源于额儿古涅-昆地域的两个氏族,出自这两个氏族的孛儿帖-赤那是朵奔伯颜的祖先,并特意强调此说来自“诚实可靠的讲述历史的突厥讲述者”^①。吉田顺一据以反推,认为正是《金册》缺失了朵奔篋儿干以上的世系与事迹,所以《史集》转而从“突厥讲述者”那里寻求口述素材^②。而《元史》卷一《太祖本纪》的纪事始于朵奔篋儿干,可知由《太祖实录》所翻译成蒙古文的《金册》亦然,后者显然与囊括了朵奔篋儿干以上世系的《脱卜赤颜》是两部不同的蒙古文史书。虽然如此,二书的个别细节仍存在密切关联。笔者曾注意到,《雅隆尊者教法史》所引《脱卜赤颜》将孛端察儿之子记作Ge-chi,Ge-chi子为sBe-khir,但又怀疑Ge-chi前的ba应在Ge后,从而读作Ge-ba-chi(合必赤)^③。但若与《史集》相较,似乎还能给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拉施特所记孛端察儿的两个儿子为不合(Būqā)与不黑台(Būqtāi)^④,虽世系有异,但读音可与Ba-Ge-chi、sBe-khir相互勘同。Ba-Ge-chi即Būqā(公鹿),后缀-chi表示职业或身份;sBe-khir即Būqtāi,-r与-t的互换也符合古代西北民族语言转译中的惯例。通过这两对人名的勘同,已不难看出《雅隆尊者教法史》所引《脱卜赤颜》与《史集》所据《金册》局部记载的相似性。

①[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6页。
②[日]吉田顺一撰,冯继钦译:《〈元史·太祖本纪〉祖先传说之研究》,《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90年第1期,第7页。
③曹金成:《〈雅隆尊者教法史〉蒙元史事考辨》,《史林》2020年第1期,第44页。
④[波斯]拉施特主编,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2分册,第15页。

上文已点出了《金册》与《圣武亲征录》的关系,最后再附带对《脱卜赤颜》与《圣武亲征录》的关系略加辨析。《元史·察罕传》载,仁宗“诏译《帝范》。又命译《脱必赤颜》名曰《圣武开天纪》,及《纪年纂要》、《太宗平金始末》等书,俱付史馆”^①。《圣武开天记》在清代乾嘉时期就已不传于世,钱大昕提出其与《圣武亲征录》的异同这一问题^②。后王国维据《圣武亲征录》中的“今爱不花驸马丞相”为世祖朝人物,指出与仁宗朝《圣武开天记》实为二书^③,故《脱卜赤颜》与《圣武亲征录》也非一书。小林高四郎甚至进一步断言《圣武亲征录》当为汉文《太祖实录》之节文^④。关于《圣武亲征录》的实录性质及其与《太祖本纪》的高度雷同,学界已有揭示^⑤,近来笔者还注意到元代藏文史书《红史》所引《脱卜赤颜》记载成吉思汗享年六十一岁,与《圣武亲征录》的一处记载完全相同^⑥,可知《圣武亲征录》的部分内容很可能参考过《脱卜赤颜》。另外,自清末何秋涛开始,学界就已发现《圣武亲征录》所记窝阔台伐金所占领的一串地名显系“音讹”,故刘迎胜怀疑《圣武亲征录》是从“非汉文史料”翻译而来^⑦。此“非汉文史料”应即《脱卜赤颜》。本文第二节曾指出《太祖实录》的编撰参考了操突厥语人员转译的《脱卜赤颜》,这种痕迹在《圣武亲征录》中亦有残留,如《元朝秘史》中著名的蒙古主儿乞部,《圣武亲征录》采用的

①宋濂:《元史》卷一三七,第3311页。按,有学者认为《纪年纂要》亦从《脱卜赤颜》汉译而来(邱树森:《回族文化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7页。霍艳芳:《中国图书官修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88页)。然已有学者根据程钜夫在皇庆元年(1312)为《纪年纂要》所撰序言否定了这种观点(时培磊:《试论元代官方史学对蒙古体制的继承》,《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第13页)。

②钱大昕著,杨勇军整理:《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圣武亲征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260页。

③王国维:《圣武亲征录校注·序》,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10—411页。

④[日]小林高四郎撰,方龄贵译:《〈圣武亲征录〉考》,《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4年第4期,第3—4页。

⑤王慎荣主编:《元史探源》,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52—53页。

⑥曹金成:《〈雅隆尊者教法史〉蒙元史事考辨》,《史林》2020年第1期,第48页。

⑦刘迎胜:《陈桎〈通鉴续编〉引文与早期蒙古史料系谱》,《清华元史》第4辑,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13页。

是其突厥语读音的汉译“月儿斤”^①,于此亦可管窥《圣武亲征录》对《脱卜赤颜》的借鉴。

综合上述,将早期蒙古史诸史料的关系制成图 1,示意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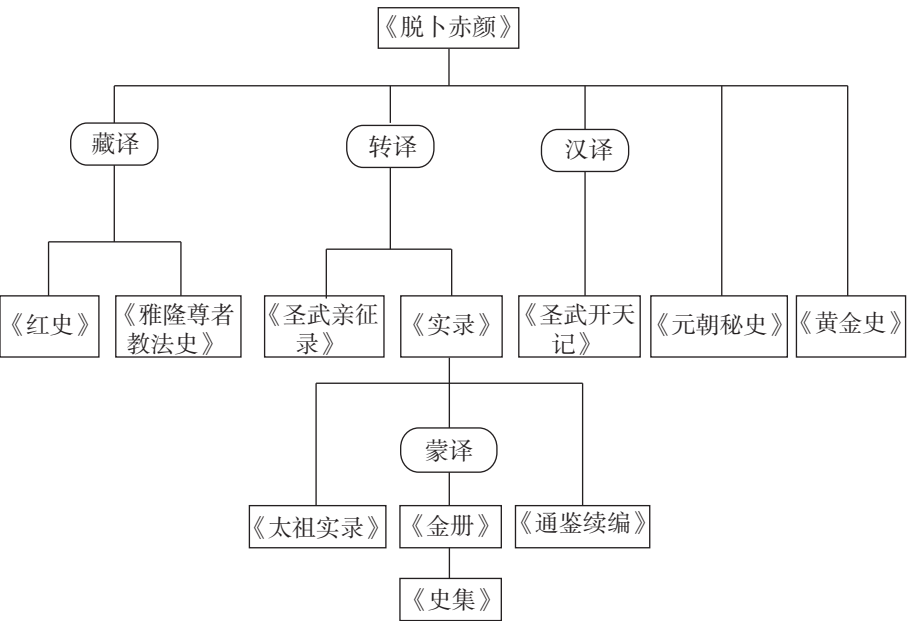


图 1 早期蒙古史诸史料关系图

【作者简介】曹金成,山东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蒙元史。

①贾敬颜校注,陈晓伟整理:《圣武亲征录(新校本)》,中华书局,2020 年,第 51 页。
同样的译例亦见于陈桎《通鉴续编》所引具有实录性质的成吉思汗纪事(曹金成:《史事与史源:〈通鉴续编〉中的蒙元王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27 页)。